

自贸区研究系列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黄贻琳 著

中美经济周期 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

经贸 新规则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贻琳 著

中美经济周期 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黄贻琳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

(自贸区研究系列)

ISBN 978-7-5432-2810-8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周期-
对比研究-美国②中国经济-经济政策-对比研究-美国
IV. ①F12②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9655 号

责任编辑 唐彬源

装帧设计 路 静

自贸区研究系列

中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

黄贻琳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

插 页 3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10-8/F·1074

定价:65.00 元

序 言

从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从 2001 年的 804.4 亿美元扩大到 2016 年的 5 196 亿美元,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加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6 年中美两国 GDP 之和占世界 GDP 的比重预计超过了 35%。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家庭生活用品和家用电器用品,美国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仅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及购买欲望,还将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从而可以想象美国的经济状况将影响中国的经济状况。考虑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两国经济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就能理解定量研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之间相互关联性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宏观经济的研究模式及方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及数量模拟方法得到了普及,宏观经济研究强调解释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通常,经济的特征事实源于可观察经济数据的方差比率、相关系数等统计特征。随着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日益变化,开放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开始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特别是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两国经济的相互联系、政策影响等问题。对于中美两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传统的定性研究较为常见,运用数量方法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思路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基于现代宏观经济的主流研究方法,借鉴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思路研究中美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及关联性,分析比较两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特征及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波动依然会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及美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将不断增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选取中国和美国

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用滤波方法提取了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及协动性等特征事实,得出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关联性呈现出弱化的倾向、美国经济的波动幅度相对低于中国经济等实证结论,并通过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解释了相应实证结论的合理性。由于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于美国侧重调控力度较轻的导向性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具有更强的政府行政色彩,财政政策的作用更显著,宏观调控力度更强。因此,《中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构建了财政税收的计量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实证讨论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问题。作者对于主要税收的研究发现,流转税、所得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呈现变化趋势,主要税种的税收收入弹性呈现出波动变化等特征。对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研究显示,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及增加资本和劳动的供给,两种税率同向变化与反向变化不仅对社会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鉴于中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根据中国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经验特征,作者还研究了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了未来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及波动特征,对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消费升级和资本深化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

本书作者黄贇琳博士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相应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本书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视角,运用现代宏观经济方法研究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相互关系,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发展的演变特征及政策选择进行比较分析,相应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研究内容,也为未来更好地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朱保华

2017年7月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001
1.1	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001
1.2	基本思路和研究内容	006
第 2 章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事实	011
2.1	经济周期的划分与波动特征	012
2.2	国别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事实	025
2.3	区域视角下中国税收周期的特征事实	051
2.4	跨国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事实	073
第 3 章	中美两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形成机制	085
3.1	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周期形成机理	086
3.2	美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形成机制	095
3.3	中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形成机制	120
3.4	中美两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评价	145
第 4 章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敏感性检验与效应分析	154
4.1	中美两国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比较分析	155
4.2	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	175
4.3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基于财政税收 RBC 模型的实证检验	188

4.4	中国地区经济波动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	209
第 5 章	中国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若干特征解释	218
5.1	居民消费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19
5.2	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235
5.3	中国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与区域差异特征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49
5.4	税制改革下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的动态特征	266
第 6 章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及宏观调控建议	281
6.1	中国、美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预测	282
6.2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292
	参考文献	307

第 1 章

绪 论

1.1 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长期的经济赶超也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如内外失衡、城乡不平衡、地区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失衡、过度投资、环境和资源制约等。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隐忧更加凸显。中国经济内外环境一度变得极为严峻,经济增长率急速下滑,农民工回乡潮、大学生就业难等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压力。“保增长、扩内需、保民生、求稳定”成为宏观政策之急。政府为此迅速启动了流动性支持、税收扶持、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产业振兴计划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使得经济较快走出低谷,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出现向好态势。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市场机制不完全、能耗过高、国际冲击加剧、长期忽视环境保护以及一些体制性矛盾冲突激化等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仍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到 2020 年中国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 年到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从现在起到 2020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和

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加快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实施适应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宏观调控策略,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这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能够得到印证。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不仅因为其具有优厚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历史机遇,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根据实际经济情况,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市场类型,但政府也会根据每一轮经济周期特点对经济运行进行市场干预。为此,本书拟从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视角,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发展的演变特征及政策选择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启发和借鉴。

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均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这一系列政策选择直接影响经济体制基础、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和宏观调控手段的改变,决定与其适应的企业制度和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决定着不同时期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形态和经济稳定的程度。正确认识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及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准确判断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周期的未来发展趋势,实证检验两个国家对不同政策选择的反应程度,科学度量某种政策调整对于经济周期的敏感程度,以及政策调整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效应和福利效应,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规律、跨国经济周期的交叉影响关系与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特征,这对于改善中国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也可进一步提升中国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决策研究水平。

在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中,单独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或中国经济周期的文献很多,但对这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特征事实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缺乏系统性和深度,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研究中,早期的一些研究更加关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各种冲击的影响,例如樊明太(1998)率先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樊纲和张晓晶(2000),刘金全和张海燕(2003)等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的关联和反应

方式对这一结论加以验证。刘树成等(2000, 2006)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角度分析我国未来经济波动的发展趋势。刘树成等(2005)、李建伟(2003)等认为,经济周期大起大落的核心是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剧烈性。此外,一些研究分析了政策冲击的影响,如吕光明(2012)认为,财政政策冲击是引起中国产出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财政支出冲击和税收收入冲击在波动贡献、作用力度、时滞、持久性等各方面作用不同。李连发和辛晓岱(2012)基于银行信贷的视角研究发现,信贷总量的适度逆周期调整有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陈昆亭等(2012)分析了1978年恢复高考的政策影响,结果发现,1978年前生产水平低、教育投入少、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干中学”的比例占优,因而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呈负相关;1978年恢复高考后,教育正常化、教育投入增加,因而波动性与增长逐渐呈正相关。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投资变动、政策调整、工业化、城市化等都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内部可能因素。

随着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开放经济环境下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例如,贾俊雪和郭庆旺(2006)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认为美国经济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外部冲击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渠道实现,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有助于经济稳定。王义中和金雪均(2009)运用含有外生变量的SVAR模型考察了国际油价、世界利率和国际需求等外部冲击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外部冲击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孙工声(2009)也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而非内部调整,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度相当高,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经济市场化演进、产业结构调整 and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段继红(2010)运用S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产出具有逆向影响,对CPI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对一年期基准利率基本没有影响。陈森和李王欣欣(2015)研究也发现,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价格水平的影响较弱,但持续性较强,国际油价波动通过实际产出效应、利率政策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三种传导渠道影响中国价格水平。李增来和梁东黎(2011)运用SVRA模型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短期内对进口、出口产生正效应,长期产生负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效应。胡兵和汪磊(2011)在对中国的出口波动进行测算后认为,出口波动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趋于平缓,意味着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未明显加剧。李成和刘生福(2013)比较分析了国内经济波动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他们认为,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后国内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加剧,但不能将其归咎于外部冲击的影响,投资波幅增大是解释经济波动加剧的最主要原因,其根源则在于宏观调控政策对本次危机的反应过度敏感。袁吉伟(2013)运用 BSVAR 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外部冲击居于次要地位,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大于对价格的影响,中国经济波动对国际经济运行也会产生影响。以上研究文献表明,国际油价波动、美国经济波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部可能因素。

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实证方法中,早期主要采用 VAR 模型、SVAR 模型、相关性分析、多元计量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分析、预测方差分解法等。早期 Friedman 和 Schwartz(1963)与 Sims(1972)采用简化式或纯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周期。随后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运用结构模型来解释,如 Lucas(1972)的新古典货币错觉模型、Fischer(1977)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RBC)或基于 DSGE 模型框架下研究政策调整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DSGE 模型将政策调整(如税收政策、政府支出等)看作经济运行中的随机冲击,经济主体(消费者和厂商)对政策冲击无法预期,只能在政策实施当期改变选择(消费者调整消费和劳动供给、厂商调整产出和劳动需求等)。

标准 RBC 模型率先由 Kydland 和 Prescott(1982)提出,它为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Hodrick 和 Prescott(1997), King 和 Rebelo(2000)等研究发现,美国经济周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事实,如服务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波动不如总产出波动剧烈,而耐用品波动比总产出波动剧烈。利用 RBC 拓展模型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的文献也十分丰富,如 Hansen(1985)不可分劳动模型,Cooley 和 Hansen(1989)现金支付约束模型,Mendoza(1991, 1995)小国开放经济模型,Backus、Kehoe 和 Kydland(1995)两国开放经济模型,Krusell 和 Smith

(1998)行为人异质模型, Beaudry 和 Portier(2004)信息冲击模型, Greenwood、Hercowitz 和 Krusell(2000)专项投资技术模型, Finn(2000)与 Barsky 和 Killian(2004)的石油价格波动模型, Kraay 和 Ventura(2007)与 Koren 和 Tenreyro(2013)地区比较优势模型等, 这些拓展模型显著提高了基本模型对美国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另外一些研究将可预期的政策变化作为一种讯息冲击引入 DSGE 模型, 探讨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Yang, 2005; House and Shapiro, 2008; Jaimovich and Rebelo, 2009)。如 Beaudry 和 Portier(2004, 2007), Jaimovich 和 Rebelo(2009)等研究发现, 当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很弱时, 税收下降的好消息才能对宏观经济产生预期的扩张效应。Mertens 和 Ravn(2011)则在模型中引入消费者偏好和调整成本, 研究税率变动不可预期和可预期下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Khan 和 Tsoukalas(2012)引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和投资专有技术变化的讯息冲击, 发现两种讯息冲击总共能够解释大约 10% 的产出波动。Beaudry 和 Portier(2014)综述了预期诱发经济波动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在国内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得到广泛应用, 运用 RBC 模型探讨中国经济波动的文献也比较丰富。卜永祥和靳炎(2002)率先在外生劳动力模型中引入货币因素来构建中国货币经济周期模型, 以此分析经济增长与货币指标的关系。随后一些研究分别在模型中引入其他变量, 如陈昆亭等(2004)引入人力资本, 黄贇琳(2005)和蔡明超等(2009)引入政府购买支出, 刘强(2005)和魏巍贤等(2012)引入石油价格和能源冲击, 胡永刚和刘方(2007)引入劳动调整成本和消费流动性约束, 陈师和赵磊(2009)引入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和资本利用率, 陈晓光和张宇麟(2010)引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异质性以及信贷约束, 徐舒等(2011)引入 R&D 投入与技术转化, 李浩等(2007)及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引入国际贸易冲击, 吴化斌等(2011)和庄子罐等(2012)引入预期讯息冲击, 肖尧和牛永青(2014)引入财政政策规则, 卞志村和高洁超(2014)引入金融变量等, 这些拓展模型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程度强于基本模型, 且引入的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波动也产生显著影响。RBC 模型在中国的拓展研究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波动的理论研究水平, 也丰富了中国宏观调控的供给政策管理内容,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2 基本思路和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中美两国实际经济的发展历程,利用相关跨国经济指标的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规律、特征事实、传导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其次,通过实证研究与政策模拟,科学度量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敏感程度、冲击影响程度和政策效应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对中国呈现出若干与美国明显不同的经济周期特征进行实证解释,如居民消费、人口变动、税收政策、土地财政等方面,运用回归计量模型和最前沿的实际经济周期研究方法对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与周期特征展开实证检验;最后,立足于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未来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和判断,从而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本书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2章主要考察中美两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周期性、协动性和持久性特征,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要素、调控政策和物价指数等方面归纳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事实,并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后面的模型实证检验提供必要的参照依据。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周期特点的繁荣与衰退特征,但也在不同时期出现相似的微波化特征。具体而言,中国在投资、政府消费、资本、货币、外贸等方面具有与美国相一致的波动特征,但在居民消费、就业、财政、物价等方面呈现出与美国显著不同的周期特征。两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动态特征也明显不同。不同周期特征事实和各国发展阶段、体制环境、调控政策等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和美国每次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由此为治理经济波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其后,在区域视角下归纳中国税收周期的特征事实,结果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全国各地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总体呈“前期慢后期快”的阶段性扩张态势,流转税和所得税仍占税收结构的主要份额,但税收总量及各主要税种的增长幅度、波动性、周期性和协同性存在显著的省份和区域差异特征,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政

策应具有针对性。最后考察中美两国的国际关联性,总结跨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结果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呈减弱态势,美国、南亚与世界经济波动则呈U形特征,相反地,韩国、日本、亚太地区和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呈倒U形特征。从总体上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更密切,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它们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规律也在增强。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着不同时期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从而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形态和稳定性能。第3章在对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传导机理分析的基础上,主要考察中美两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形成机制。一方面,从信息技术、新经济、产业结构、金融创新、财政与货币政策等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下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现实,从所有制结构、社会总供求关系、经济结构、价格体制、调控手段和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转变,探究宏观调控对中国经济波动形成机制的影响。分析发现,在美国,不同时期的总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就其共性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借助有系统的调节机制,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规范等,各种政策的协调搭配对总体经济产生了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宏观调控的理念、目标、方式与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由以计划行政手段为主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转变。比较而言,美国宏观调控更侧重于调控力度较轻的导向性政策,通过政策诱导,自发调整个人消费与投资,政策更多的是从下而上作用于宏观经济。而中国不具备完善的市场体系,经济增长存在赶超趋势,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颇具过渡特色,一般性政策工具不起作用,需要采用一定程度的政府调控来替代。因此,中国宏观调控力度更强,频率更高,政策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作用于宏观经济,政府倾向于使用调控力度大而作用迅速的政策工具。

第4章展开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敏感性检验与政策效应分析,这有利于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方面“对症下药”,有效防范国内外各种经济冲击的影响。一方面,基于多宏观经济指标的综合考察,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稳定性及其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实证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周期整体具有比中国经济周期更强的稳定性,更有助于削弱外部冲击的影响。相对于美国,中国的居民消费、总就业、财政与货币、外贸等领域经济运

行的周期成分比较平稳,而在投资、物价指数、劳动产业分布等领域经济运行的周期成分却显示出频繁的波动;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贸易依存度的提高、相对稳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不利影响。此外,从总体上看,国内供给冲击是影响中国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国内需求冲击则是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来自美国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传导影响中国产出波动,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渠道传导则主要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率波动,外国经济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来自国际方面(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予以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第4章基于全国和区域视角,构建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和计量回归模型,探讨中国经济周期的税收政策效应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全国视角下,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及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因此,政府在选择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控时,多种税收组合对经济增长与福利影响的综合作用情况相对复杂,在制定“稳定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结合”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各种税收之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或放大作用。区域视角下,分税制改革不是引起东、中、西部地区和省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税收政策效应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税收政策总体上对东部经济发挥稳定作用,对中部经济具有微弱的稳定作用,对西部经济作用不显著。税收政策效应的差异性也同样体现在省份经济波动的影响中。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税收政策造成的非对称性的区域效果,合理利用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由于中国呈现出若干与美国经济周期明显不同的特征事实,第5章主要考察中国经济周期与政策选择的若干典型特征,探寻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异性及其产生

特异性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突出问题,为此,本章首先研究引起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的消费因素与人口因素。一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的分析,实证检验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的暂时性增加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抑制作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但其影响是正向的;CPI的持续上升不仅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会产生抑制作用。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稳定、建立新的消费热点是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揭示人口在年龄、文化、城乡、产业、失业、职业和性别等方面的结构变化特征及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口结构演变总体上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文化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则起到了阻碍作用;人口结构变化对不同省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存在差异;随着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大大减轻,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成为制约长三角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决策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解决人口问题时,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实施有差别的调控政策。

第5章还考察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土地财政和宏观税负问题。一是从历史条件、地方政府的收支约束和制度环境三方面对中国地方土地财政的形成原因展开理论分析,并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和区域差异的动态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展因素和制度变化因素均是影响中国土地财政变动的重要方面;土地财政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的增长会形成惯性而影响后期的增长;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缺口、腐败程度、区域竞争和土地融资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在二元土地制度、财政信息披露程度、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只是程度不同。政府在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实施差别的调控政策。二是在回顾中国税制改革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宏观税负和税收结构的视角探讨中国税收变化的动态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的下降趋势转变为1994年后的上升态势;宏观税负在1985年“利改税”前平稳增长且与经济增长无关,1985年后则呈“先降后升”态势且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同样地,税收结构中流转税、所得税、营业税、消

费税,关税等各主要税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不断调整,各主要税种的税收收入弹性呈波动变化特征,但波动幅度各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主要税种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税收收入弹性的波动除了受税收制度本身的影响外,还受经济波动的影响。

第6章是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及宏观调控建议。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将在全球经济结构、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国家关系等方面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总体影响倾向于减慢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其中也蕴涵着一些机遇。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周期将呈上下波动特征;美国实际产出波动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周期可能经历从复苏到繁荣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周期也呈缓和波动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负向协动变化趋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负向协动性将趋于减弱,而美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呈显著的正向同步变化规律,美国经济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外,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中原有的比较优势将趋于弱化,收入分配、要素供给、资源约束等各种矛盾逐步凸显,这为结构调整带来机遇,消费升级和资本深化等也将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和特征,如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对外经济依赖程度高,城乡居民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相对迟缓,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对外出口下降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和困境。为此,政府应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不断优化;继续巩固和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绿色增长、创新增长、包容式增长的轨道上;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从而有利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